

受教育程度对妇女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基于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祝平燕¹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以政治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的男女两性参政和城乡妇女参政的对比的角度,分析妇女受教育程度是如何影响妇女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借此检讨我国妇女参政发展缓慢的原因,寻求推动妇女参政快速发展的良策。

[关键词]妇女; 教育程度; 参政; 正相关

Investigation of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Women's Educational Level and thei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ZhuPing-yan Huang Dan Zhu L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related theory of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It is making analysis of how educational level influences women'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from the comparisons of male and female, and women in city and countryside who take part in the politics in China. This paper introspects the reason why the progress in wome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so slowly, and seeks good methods for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i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 words]women; educational leve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sitive correlation

妇女参政状况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就业状况、妇女受教育程度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妇女参政。其中妇女受教育程度是妇女参政的先决条件。研究表明,女性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经济地位相应提高,女性的主体意识、政治成就感、意志力以及参政议政能力都将不断增强。随着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干部的选拔机制上,

¹祝平燕(1964—),女,湖南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哲学、性别社会学和社会工作

已呈现出从静态任免或向动态竞争式转变,从组织安排型向实际能力型转变的趋势,这就对女性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提高女性的素质和能力的主要途径就是让她们接受教育和培训。

一、受教育程度与妇女政治态度

西方的研究证明,在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公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有着相当直接的影响作用。首先,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政治信息和政治符号有更为清楚、深刻的理解,所以他们有着较强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责任心,一般会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多地介入政治。其次,文化程度的高低还会影响到人们参与政治的方式。一般说来,文化程度高的人在参与政治时会更多的凭理性而不是凭感情行事,因而在对参与方式的选择上会注意合法性和有效性。而文化程度低的人则相反。¹

妇女参政首先表现在政治态度上。政治态度也叫作政治参与的态度,是指政治主体对政治参与的情感、动机和评价等,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政治参与心理。它包括政治关心、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和政治义务感等要素。

政治关心可以用一个人是否经常关心政治新闻、是否经常与家人及朋友讨论政治问题这类标准进行测量。一般说来,关心政治的人,表现出较高的政治参与活动水平。¹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倾向于关心政治。Tong, J 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男女两性表现出对媒体、政治知识、参与非选举行为的关注都要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男女两性要多一些。教育程度高的女性较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得分要高些,41.4%的拥有高中教育水平的女性每天都关注媒体,而只有30.3%的拥有小学教育水平的男性会这么做。¹中国的调查也表明,男女相比较,男性比女性更关心政治;城乡女性相比较,城市女性比农村女性更关心政治。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中,有两个问题可以反映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兴趣。一个问题是“最近三年是否主动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回答显示,男性主动提建议的比例更高。在被访者中,“最近三年主动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的男性有31.3%,女性只15.1%,男性比女性高出16个百分点。女性“最近三年主动给单位、社区/村提建议”的比例与其文化程度呈正比关系:文化程度越高,比例越高;文化程度越低,比例越低。在15%的主动提建议的女性中,文盲半文盲的有6.2%,小学程度的有12.4%,初中程度的有15.3%,高中程度的有21.5%,中专程度的有27.5%,大专及大专以上程度的有37.9%。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湖北省第二期妇

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近三年主动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过建议的妇女占 20.0%，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妇女占 11.6%，男性占 19.8%。近三年没有主动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过建议的妇女占 80.0%，没有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妇女占 88.4%，说明湖北省的妇女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比较明显低于男性。¹从城乡女性的比较来看，湖北城镇妇女对我国国家主席的知晓率比农村妇女高 2 个百分点，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本市市长/本县县长的知晓分别比农村妇女高 9.2 和 17.2 个百分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妇女的知晓比例高达 100%，而未上过学的妇女知晓的比例分别为 66.7%和 55.6%。¹

妇女参政的政治态度还表现在政治效能感上，所谓政治效能感，即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家和政治秩序的感觉。政治学者经常用这样的问题测定一个人的政治效能感：你认为像你这样的人对政府的活动有多大影响——很大、中等、还是根本没有？对这些问题作“中等”或“很大”回答的公民，就具有较强的政治效能感，参与政治的水平也可能高些。……另外，政治效能感通常还牵涉到公民对个人政治能力的评价。如果一个公民在政治经历中善于发现其政治绩效，他就会感到自己在政治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反之，如果他在政治经历中没有取得过什么绩效，他就会对自己的政治能力评价很低，或者说，有一种政治无力感。¹

政治效能感在男女两性中存在着差异，从不同性别投票选举地方人大代表的态度可以了解妇女的政治效能感的大小。2000 年湖北妇女社会地位第二次调查结果表明，湖北男女两性的政治效能感比较来看仍有差异，在投票选举人大代表时，有 74.2%的妇女能尽力了解候选人情况，认真投票。“主要是为了完成任务”的妇女比例为 14.6%，这部分妇女参与选举是被动的、服从性的；“让别人代投，选谁无所谓”的妇女比例为 5.3%，表明她们的政治效能感差。“尽力了解候选人情况，认真投票”的妇女比男性低 2.7 个百分点，“让别人代投，选谁无所谓”的妇女比男性高 1.3 个百分点。¹

妇女参政的政治态度还表现在政治信任和政治义务感上面。政治信任具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如何看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政治活动。如果把政治看作是权势人物的肮脏交易，看作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术，那是谈不上有政治信任的。政治信任的第二种含义是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对待自己的政治行为。如果公民在表面上虽然也参加了各种政治活动，甚至非常积极，但在主观上却认为自己这样做不过是迫于某种压力而敷衍应付，或者仅仅是把政治参与作为达到其他非政

治目的一种手段，那么他对政治也无信任可言。无政治信任的公民一般是将自己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¹我们通过访谈发现，与男性相比，许多女性由于不了解政治，常常把参政看作是政客之间的肮脏的交易和勾心斗角，对此不屑一顾。她们常常不了解为何一些男性为职务的升迁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和抗争。政治义务感是公民对其职责的认识，或者说，是一种公民的角色感。政治义务感强的公民，会把参政作为一种责无旁贷的任务，即使参与政治使他付出某些个人方面的代价，他也在所不辞，全力以赴；反之，若是政治义务感不强的公民，则会把政治参与社为一种额外的负担，只有当政治与个人利益发生直接关系之时，才会对政治参与有兴趣，否则宁可置身于政治之外。¹2002年6~10月由中国教育工会湖北省委员会和华中师大委员会、华中师大妇女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对湖北省16所高校知识女性的发展状况调查表明，高校一些知识女性不太关心国内外大事，她们很少收看新闻联播和午间新闻，甚至有的人连报刊也很少看。在回答“我省现任常委或副省长以上的女干部”时，有60%的人回答错误，未作答的有22.8%，回答正确的仅占17.2%。¹这说明即便是具有较高学历的知识女性其政治义务感仍然很弱。

二、受教育程度与妇女政治参与行为

公民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如投票、选举、组党、结社都属于政治参与行为，政治参与行为是政治参与意识的升华。主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能直观地反映其政治发展状况。

女性的政治地位，是通过她们在社会各项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水平来体现的。我们可以从投票选举、参与社会利益团体、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等方面来了解妇女的政治参与行为。

投票选举是一种直接参政行为，也是政治参与方式中规模最大的政治活动，妇女通过行使选举权，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山东省2000年的调查表明，文化程度与女性的参选的积极主动态度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的女性，往往参加投票选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越高，而且男女之间的差距也越小。相反，低学历的女性中，消极应付的成分较多，男女差距也较大。¹

其次是通过参与政党组织来实现参政议政的目的。亨廷顿说过：个人视自己与团体为一体的意识越强烈，他或她就越有可能卷入组织和参与政治。加入团体组织对于个人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对于个人而言，加入团体或组织意味着获得了一份社会资源，可以在某一范围内参与对社会事务的决策、管理或协商。在中

国社会中，以政治参与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通常有三种，即参加政党、专业或职业团体，如工会、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等以及利益集团。

参加政党活动，在政党中担任职务是女性参政的重要渠道。一般说来，不加入党派的女性也可能有较强的参政议政意识，但加入一个党派更是将参与意识付诸实施的表现。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女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例可以直接标志女性参政议政的愿望。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男性中中共党员的比例为15.7%，女性中央共党员的比例仅为5.2%，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若把被访中国共产党党员按性别划分，则男党员占75.7%，女党员占24.3%，女党员占全体党员比例不足1/4。民主党派的党员性别构成显示，加入民主党派的女性比加入共产党的比例要高。¹在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中，女性占有较高比例，其中有七个党派女党员比例超过30%。但总的说来，女性占各种民主党派的比例总体上要低于男性。

在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是人们为了通过影响政府决策而维护共同的利益或实现其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目标而结成的集团。在我国，这些利益集团主要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它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合法的方式参与国家和社会的各种事务的管理。与投票选举、参加社团相比，进入权利领域、担领导或负责人、行使决策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妇女参加社团组织，在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提高女性的科学素质，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男女两性参与利益集团的比较来看，妇女与男性在参加社会利益团体方面有一定差距。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城乡女性参加工会的人数最多，至2002年，全国参与工会组织的女性比例为34.8%，男性为65.2%。¹其次为参加专业或行业组织，山东省2000年的调查显示，11.3%的城镇女性和2.8%的农村妇女表示参加过组织或社团，分别比男性低7个和2.5个百分点。5.7%的城镇女性和1.9%的农村妇女参加过联谊组织，比城乡男性分别低1.4和0.2个百分点。¹据2001年全国妇联的统计，与男性相比，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为24.8%。同男性相比，无论何种组织或团体，妇女参与人数均少于男性。

三、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是推进妇女参政发展的先决条件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干部的选拔机制上，已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势：即从静态任免式向动态竞争式转变，从组织安排型向实际能力型转变，这就对女性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提高女性的素质和能力的首

要途径就是让她们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一般说来，文化素质越高的女性，其参政和议政的水准也会越高。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北欧诸国，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独立精神和参政意识都很强。南亚和东南亚诸国当政的女性虽然继承的是家族政治，但她们基本上都受过高等教育。

教育是一项人权，是实现平等发展目标的重要工具，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机会，是促进妇女素质提高，参加社会生产与社会决策的重要条件，有益于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教育对个人的阶层位置及其经济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能力社会”而不是“身份社会”，个人可以通过良好的教育获得能力并以个人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是，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2003年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年龄介于18~69岁的当地市区居民中，采用街访和电话访问相结合的方式，在无提示的状况下就男女在公共领域中实际享有的权利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受教育水准方面，女性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63.5%的女性受教育水准在高中程度(包括高中、中专、中技和职高)以下，而男性为56.3%。13.5%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在大学本科及以上，男性的相应比例则为19%，高出5.5个百分点。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相应人群中女性比例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初中及以下和高中程度的人群中，女性的比例都要高于男性，分别为54.9%，51.9%。而在大专、大学和硕士及以上三个人群中，女性的比例也都低于男性，分别为48.4%、42.3%和33.3%。¹

在中国，妇女是分为不同层次的，针对不同层次的女性采取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应该是各不相同的。

(1) 首先必须解决女童的基础教育问题。在社会经济不够发达的农村，女性常常不能得到与男孩平等的教育机会，很显然，教育中存在着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对于农村地区来说，高中已经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学费相对于农村微薄的收入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家长在决定哪个孩子上高中时就会谨慎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男孩进入高中的可能性更大，家庭也比较愿意为男孩的教育投资(因为女孩迟早要出嫁)，因此，进入高中的女生相对较少。¹12~18岁大龄女童的失学和辍学令人担忧，越是高级阶段男女教育的差距越大。这就要求法律政策及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改善，普及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促使女童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增加女性接受高中以上程度教育的机会，减少女性接受教育的障碍，消

除对女童的歧视，特别是要重点降低西部地区女童辍学率，实现流动人口中儿童接受正规教育目标，杜绝女性新文盲的出现。

(2) 通过妇女成人教育，全面提高妇女整体素质。妇女成人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更新知识结构，还可以提高妇女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参与意识。妇女成人教育对妇女参政的发展作用体现在：第一，妇女成人教育的发展，保证了妇女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改善妇女干部学历构成，势必提高妇女参政的层次。第二，妇女成人教育的发展，推进了妇女参政的广泛性。随着妇女成人教育的发展，妇女参政领域不断扩宽，一大批中青年女性不仅走向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管理阶层，而且成为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者。成人教育的途径很多，包括成人高校、党校、成人中专、妇女干部学校、职业女子学校以及各类女子培训班，等等。

(3) 妇女接受高等教育是妇女就业、参政，进而在社会中取得平等地位，从根本上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

从历史上来看，传统女性对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事务漠不关心，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则比较关心国事，敢于就社会问题发表见解。¹高学历女性由于受到先进文化的熏陶，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敢于冲破传统落后的性别文化对女性的束缚，追求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

高等教育提高了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的能力，而经济地位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妇女的政治参与程度。具有高学历的女性比低文化的女性求职更具优势，不仅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工作，如，科学技术、文化卫生、管理等工作，还能扩大就职领域，从传统的“女性职业”如女佣、护士、秘书等职业向“男性职业”流动，如，法官、律师、工程师、政府官员，等等。这种情形无论在在东南亚还是在中国都莫不如此；¹高等教育还能提高妇女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的能力。高等教育不仅传授给妇女文化知识，而且增长了才干。无论在南亚、东南亚还是中国历史上，参与社会政治事物的很多是中产阶级妇女，而且她们多是从事教授、律师、医生和研究人员等职业。

(4) 对有参政意向的女性进行参政能力教育和培训。领导能力是一个由若干要素构成的体系。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根本性能力、应用性能力、基础性能力这三个层次的能力，女干部的能力建设不仅要按这三个层次来进行，还必须增加第四个层次的能力，即妇女参政的特殊能力。其具体内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根本性能力。妇女干部要努力提高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能力、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能力、贯彻党的组织路线的能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能力、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能力。这五种能力是妇女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根本性能力，对应用性能力直接起着直接的支撑作用。

(2) 应用性能力。就是十六大提出的“五种能力”，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这五种能力似可称之为应用性能力，是与领导事务和政务活动紧密对接的能力。

(3) 基础性能力。如敏锐超前的思维能力、改革创新能力、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组织实施能力，等等。

(4) 特殊性能力。即与妇女参政目标相关、与妇女自身特点相关的特殊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具备社会性别意识、对女性姐妹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和支持、对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特点的理解能力，等等。

总之，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是妇女参政的先决条件，惟有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才能提高妇女的社会经济水平，继而提高妇女的参政能力；只有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才能参与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只有提高各个层次妇女的文化素质，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妇女的参政发展。

